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十分册

(美) 包华德 主编

沈自敏译

赵 杰校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资
料
丛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十分册

(美) 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赵 杰校

(征求意见稿)

中 华 书 局

1981年7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十分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1981年7月印刷

定价0.63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译稿如引用，请核对原文。

目 录

孙逸仙	(1)
宋哲元	(23)
宋教仁	(25)
宋汉章	(29)
宋希濂	(31)
戴爱莲	(32)
戴季陶	(34)
戴 笠	(40)
太 虚	(43)
覃 振	(44)
谭鑫培	(50)
谭延闿	(52)
唐继尧	(55)
汤恩伯	(58)
汤化龙	(63)
唐绍仪	(66)
唐生智	(70)
汤用彤	(73)

陶希圣.....	(75)
陶行知.....	(78)
邓锡候.....	(84)
邓 铿.....	(86)
邓泽如.....	(88)
邓演达.....	(91)
附 录.....	(96)

孙逸仙 原名孙文

字：帝象 号：日新：逸仙 中山 化名： 中山樵

孙逸仙（1866.11.12—1925.3.12），民国革命和国民党领袖，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该地靠海，在葡属殖民地澳门以北约三十哩。他的祖辈世代务农，父亲在澳门做了几年裁缝后，在孙逸仙出生前回家乡继承祖业。孙逸仙六岁时在村塾读儒家启蒙书籍。1879年被送往夏威夷其长兄孙眉（1854—1914，字：德彰，号：寿屏）处，他已在该地务农经商多年，相当富裕。孙逸仙在檀香山进了英国教会创办的一个少年寄宿学校意奥兰尼学校读书，学习英语、科学知识和基督教教义。1882年毕业后回翠亨村。此时，他所受的西方世界的知识和基督教教育，使他把乡人的传统的宗教信仰看成只是迷信。他回来不久，就折断村庙中佛象的手指，表示对迷信习俗的怀疑。这个青年人的鲁莽举动引起村民的愤怒，把他驱赶出村。

1883年秋，孙逸仙去香港，第二年春天进了英国教会的拔萃书室，后又转到港英政府开办的皇仁书院，在那里接受美国教士喜嘉理的洗礼入了教，不久回家与一个本地姑娘结婚。1886年去檀香山探望长兄回国，决定行医，到广州进了博济医院附设的博济医校，该院是西方在华开办最早的医院，院长为美国医学传教士克尔。1887年他离广州去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西医书院，从医校主任康德黎学医五年。1892年毕业时获得内外科成绩优良的证书。他去澳门，但因没有行医执照被澳门当局勒令离境，1893年春他开始在香港开业。

孙逸仙在广州、香港学医时，已热心注意国内政治，立志推翻满清政府。据说他童年在翠亨村听太平天国故事时就有这种想法，而他本人总是把他的革命思想的来源归之于早年所受的基督教教育，归之于他对香港英国政府的效能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作的对比，归之于他目睹清朝统治者无力捍卫国土，抵御外国侵略，尤其是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他早期的这些不满，随着他在广州、香港同思想激进的青年的接触而加强。1886年他在广州学医时，结识了同学郑士良（1901年去世，号弼臣），他原是华南最大的反满秘密组织

三合会的成员。他在香港学医时，又结识了同他一样具有反满意识的陈少白。1893年他从澳门回香港后，同这些同学以及儿时的家乡伙伴陆皓东来往。他们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复兴中国的计划，谈论推翻清朝统治者的可能性。

他们的这些讨论虽然带有反叛的调子，但孙逸仙当时显然还不准备公开投身革命事业，相反，他决定致力于改良现行政治。1894年2月，他放弃无人问津的医业去天津，向直隶总督和中国主张革新的人物之一李鸿章上书提出改良建议，这封政治上无害的书信，一般地陈述了谋求中国自强的道路，特别着重说明运用西方科学技术改进农业生产的重要。是年夏，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忙于战事而无暇顾及这些事。孙逸仙在失望之余去夏威夷，准备向私人募款以实现他的农业计划。1894年11月，他得到长兄和其他华侨团体的支持，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其目的在于“恢复中华”，为达此目的所需经费，由会员购买该会的份例筹募。

1894年秋冬之际，在朝鲜的日本军队击败了中国军队，并迅速向南满挺进，使北京亦受到威胁。孙逸仙在国内的朋友认为华北的清军覆亡在即，这正是举行革命起义、推翻清政府的大好机会。孙逸仙接获国内急电，于1895年1月离檀香山经日本回香港，与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同人决定联合由英国轮船公司职员杨衢云（1861—1901，字：肇春）在1892年创立的秘密革命团体辅仁文社的势力，组织一个新的革命团体，成为兴中会的一个主要支部。这个革命团体公开的活动是办报纸、设学校、兴工业、强中华，而其主要的目的则在组织一次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革命起义。他们准备在10月间袭击广州。1895年春夏之际，杨衢云在香港筹款购买军械，孙逸仙、郑士良、陆皓东去广州结集因马关条约的规定而解散的部队士兵，并约同秘密会社成员组织了一个名义上研究农业的革命团体“农学会”。但是在预定起义的前一天，起义计划为广州当局发现，起义者多人被捕，陆皓东遇害，孙及少数几人逃往香港，但港英当局应清政府之请命令他们离境。1895年10月底，孙逸仙和他的几个同志避居日本。

在海外的革命活动

1895年广州起义后，孙逸仙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活。他被清政府悬赏通

缉，在此后的十六个年头里，他为了逃脱清政府的追捕，被迫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他在11月抵横滨，建立了兴中会支部，由当地的一个居民和同情者冯镜如主持。此时，孙逸仙为把自己乔装成现代日本人，剪去辫子，留了胡须，改穿西服，然后去檀香山与其兄同住。1896年，他的家人前来同他会合。他在夏威夷，从当地秘密会社中吸收兴中会会员，并和洪门会支部建立联系。1896年6月他去旧金山，争取致公党、洪门会人士的支持。当时，洪门会成员虽因反满而建立组织，但却认为中国现政府能够很好代表他们这些在美国的侨民的利益，因此，他们对孙逸仙的革命计划很少兴趣。

孙逸仙离开美国到英国去探望退休回国的老师康德黎博士。他在英国的活动，始终被清政府派人监视。1896年10月11日，他路经泡特兰路中国使馆，被使馆人员劫持，中国公使及使馆人员准备租船把孙押送回国以叛乱罪处死。孙设法把消息通知康德黎，康说服了英国政府使孙获释。这件事引起了广泛注意，一个不知名的政治流亡者，一夜之间成了国际上大名鼎鼎的革命家。经此事件，他在伦敦平静地住了几个月，其间，他常去大英博物馆阅读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其中包括马克思的著作和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著作，乔治的赋税和地租学说对孙逸仙今后社会经济思想的形成有相当影响。

1897年7月，在英国居留十个月后，孙逸仙经加拿大去日本横滨、东京，争取那里华侨社团的支援。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他改用日本常用的名字中山樵，此后，中山之名就为他的中国同事们所熟悉。虽然他在保守的旅日华侨中进展很少，但是却得到日本自由派如冒险家和亲华份子宫崎寅藏等人的更多支持。他到横滨不久宫崎即同他接近，并成为他最热烈的日本追随者。宫崎介绍他结识了几个著名的日本自由派人士，包括宫崎的恩主犬养毅（1855—1932）、大隈重信（1832—1922）。他们出于联合亚洲人共同抵抗西方势力的考虑，很愿意和中国进步分子合作使中国强大起来。犬养毅是如此的信从孙逸仙，为他在东京提供住所和活动经费。当时另一个引起日本自由派注意的中国团体，是康有为及其杰出的信徒梁启超等人的改良派。自从1898年9月保守派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避居日本。孙逸仙和他的日本友人要求改良派同革命派联合共谋恢复中华。但是，顽固的保皇派康、梁不准其徒众同孙及兴中会合作，并于1899

年成立了保皇会，成为日本、东南亚、美国华侨革命势力的顽敌。

孙逸仙、陈少白、郑士良和日本兴中会会员，准备在华中、华南联合秘密会社，再次举行一系列起义。1899年到1900年间，他们集中力量准备在广州以东的惠州起义。陈少白在香港出版《中国日报》从事革命宣传，郑士良联络了三合会及其他秘密会党，孙逸仙同日本的合作者们筹集军械。1900年10月，孙逸仙去台湾等待日本运来军械。郑士良惠州起义一度得手，但因由日本运来的军械没有到达，又接到孙逸仙的信息，遂将部队解散逃往香港。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逸仙返回日本，在横滨不事声张地住了三年。当时，东京成了中国政治犯和来日接受近代教育的留日学生的中心，新来的人之中，受梁启超的作品吸引而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很多。但是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一再遭受屈辱，促使留日学生组织的团体和报纸的政治观点不断趋于激烈。孙逸仙在这些青年人中看到了支持他的革命事业的新的的人才，在横滨经常和这些激进青年来往，和他们商量在学生中组织革命团体。

由于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想的发展，孙逸仙能再次在华侨中吸收兴中会会员。1903年他去东南亚，在河内建立支部，又去西贡、暹罗吸收会员。7月回横滨，9月去美国筹款和争取支持。1904年4月到12月，孙逸仙在檀香山、美国等地的活动，屡次遭到康梁保皇派的强烈反对，保皇派在华侨中很有势力，但是孙逸仙还是得到了很多支持。1904年12月他去英国，1905年上半年到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等处设立兴中会支部。

同盟会的创立

1905年6月，孙逸仙离开欧洲经新加坡、西贡去日本。9月中他抵达横滨，发现留日学生因日本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取得令人惊讶的胜利而掀起了一股新的爱国激情。当时，华兴会创始人黄兴、宋教仁也到了日本。孙逸仙经宫崎寅藏的介绍，结识了他们和其他革命领袖。他同他们讨论将华兴会、兴中会及其他激进的旅日学生组织合并成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7月30日，在东京举行筹备会议，确定新的组织为“中国同盟会”，以到会的七十人为会员。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留日学生及其他革命青年三百人加入同盟会，由黄兴提议，举孙逸仙为总理。

同盟会和孙逸仙过去组织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有很大的不同。兴中会是由很分散而自行其是、行动很不协调的支部组成的，同盟会则是一个集中而组织严密的团体，它的总部在东京，下分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协调全国各省及香港和东南亚等特殊地区分部的活动。两个组织的会员成份也很不相同，兴中会会员以华南秘密会社的成员和华侨商人、工匠为主，而同盟会则以几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为核心，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人起而取代过去兴中会的一些老人而成为孙的亲密助手。最大的区别还在于革命纲领的不同。兴中会的纲领是从孙中山早年以改良方法求得中国富强的建议引申而得的三个信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而同盟会的基本原则则是三民主义。1905年之际，孙逸仙受到亨利·乔治等人思想的影响，已经形成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孙逸仙的这种思想曾在1905年春对留欧的中国学生演讲时第一次提了出来。同盟会建立时，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作了概略叙述的孙逸仙的革命纲领被写进了同盟会会章，其后几年，这个主义和纲领在1905年11月于东京创刊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作了详细阐述。

同盟会成立后，孙逸仙及其同事们开始了更紧张的革命活动。他们立即开始募款，又在国内和华侨中发展组织，并准备新的反满起义。1905年10月，孙逸仙由日本到东南亚各地，次年他在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和马来亚的其他地方、东印度群岛建立同盟会支部。1906年秋，孙逸仙回日本，在纪念《民报》一周年的群众集会上，他向几千名学生发表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其时，留日学生不断增长的激进倾向，引起日本当局的注意决定应清政府的要求，将孙逸仙驱逐出境。但是，孙在日本政府中的朋友仍然希望和革命领袖保持良好关系，并秘密资助他在别处开展革命活动。

孙逸仙离开日本之前，和黄兴及同盟会其他领袖人物商订推翻清政府的军事行动计划。日本、香港等地对孙逸仙等人革命活动的限制日益增加，他们得悉印度支那法国当局对他们的事业比较同情并愿意提供秘密活动基地，因此决定在那里设立军事指挥机构，并准备集中在中国西南边界各个地点开展活动。1907年8月初，孙逸仙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去河内，经一些法国军官的帮助，开始训练一支人数很少的革命部队，同时在日本筹集军械。1907年春夏之

际，广东内部不安，孙逸仙趁机在5、6月于汕头、惠州起义，先后为清军镇压。9月在钦州的起义也失败了。12月在广西边境举行起义，孙逸仙、黄兴、胡汉民由河内前去，一度攻占镇南关，不久又为陆荣廷军击败，于是退回到法属地区。在这几次起义中，革命军采用了一些新的战略，例如在外国邻近的地区联合秘密会社和当地反叛的武装力量，渗入到清朝军队中去争取其中的官兵。但是革命力量还仍是由几百名未经训练的冒险分子、不谙军事的人领导，因而很少有希望击败装备良好数量众多的清朝军队。他们的战略失败，也由于他们未能从日本获得必要的军械运送到国内。

1907年底孙逸仙在镇南关时，清政府说服了法国当局将他驱逐出印度支那。1908年3月，孙逸仙去新加坡筹款购买军械，运送给在河内的胡汉民、黄兴。前者是孙留下以筹划新的军事行动，后者则由日本回国组织新的起义。1908年春，广东钦州、廉州、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胡、黄率部几百人离开印度支那。7月，胡、黄、孙在新加坡会合。当时，革命趋于低潮。华南地区几次起义的失败，不但使聚集在马来亚的领袖人物垂头丧气，而且也影响了东南亚华侨对同盟会的信仰。1908年到1909年之间，当他们在马来亚、暹罗巡行期间，发现当地居民不愿对一个看来已经失败的事业再作贡献。虽然孙在东南亚建立了由胡汉民主持、在暹罗建立了由萧佛成主持的同盟会支部，但是他的运动没有成功。

此外，同盟会内部日渐出现了对孙逸仙领导的不满情绪，日本政府又于1908年8月封闭《民报》，镇压革命党的活动。

辛亥革命

1909年春末，孙逸仙几乎在东亚各地都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了，他的活动都受到限制，因此决定去欧洲，以便为革命进行有效活动。1909年5月，孙逸仙去法国之前，下令在香港建立了同盟会华南支部，由胡汉民主持。他又把他离去期间国内的革命活动、同盟会在东南亚的发展等工作的实际责任都交给了胡汉民和黄兴。

孙逸仙在巴黎募款毫无结果，又短期去布鲁塞尔、伦敦，1909年10月去美国。他在《华美新闻报》上公布了他的账目，以驳斥章炳麟和同盟会会员中一

些持异见者说他滥用会款的责难。孙逸仙在美国、加拿大旅行的五个月期间,发现华侨中保皇派的力量大为减弱,华侨已比1904年时远为愿意接受他的推翻清朝统治的观点。因此,孙逸仙能募集到不少捐款,并且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建立同盟会支部。1910年3月他去檀香山,两个月后又去日本,与仍在东京的同盟会领袖们重新接触,计划重新建立一个秘密组织,以便与全国各地的革命团体相结合。孙逸仙虽用化名住在犬养毅家中,不久又被清政府发觉,要求日本政府加以驱逐。因此孙逸仙到日本只有十天,便即离去。

孙逸仙到新加坡后又去槟榔屿。11月他邀集黄兴、胡汉民商议,决定由黄兴领导在广州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不久,马来亚英国当局以孙逸仙的一次演讲内容不当为由迫其离境。孙逸仙失去了在远东的最后一个落脚点,再次去北美募款。12月他离开槟榔屿,经欧洲到美国、加拿大,1911年2月中旬到纽约。他在旧金山、温哥华、维多利亚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短期内募集了八万美元支持他广州起义的计划。广州的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引起了华侨的极大注意,华侨的革命热情显然增加。孙逸仙决定暂时留在美国,以便募款继续支援国内的革命活动。

同盟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注意力开始集中长江一带,尤其是对武汉、南京两个城市。1911年7月,居正、陈其美、宋教仁筹设了中部同盟会,设总办事处于上海公共租界湖北地区的革命势力已渗入清政府驻武汉的新军之中。孙逸仙对这些情况虽然并非不知道,但他和国内的同事们却很少联系。因此,10月10日武汉起义和革命的消息,他事先并无所知,而是在从丹佛到堪萨斯的旅途中读报时才知道的。接着他从美国报纸中进一步了解到国内革命党人正在计划建立共和政府并由他担任总统的消息。孙逸仙认为正在拟议中的新政府和西方列强的关系很重要,因此,他决定暂不回国,而以中国最大革命政党领袖的身份到欧洲活动,希望能得到各国政治和经济领导人的外交承认并取得大宗借款。10月底,他到伦敦,说服英国政府取消了对他在远东英属地活动的限制,并获得四国银行团口头同意停止贷款给清政府。然后他去巴黎与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会谈,讨论了法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问题,但未达成具体协议。1911年11月,孙逸仙由张继、李石曾、吴稚晖陪同由马赛启程回国。

孙逸仙回国时，上海、南京已为革命军攻克，几个省份相继宣告独立。清朝政府在绝望之中，把政府大权交给了袁世凯；十四省代表会集南京，讨论成立临时民国政府；伍廷芳、唐绍仪分别代表南北政府在上海进行和议。1911年12月25日，孙逸仙到上海，受到同盟会会员和其他信从者的凯旋式的欢迎。四天后，各省代表在南京公举孙逸仙为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逸仙去南京就职，正式宣布中华民国的成立。

中华民国和国民党

经过十六年的流亡生活之后，孙逸仙在南京就任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他的革命生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他和他的同志们争取的革命目标，却还远未达到：满清皇帝仍高踞皇座，北京王朝仍是各国承认的政府；上海和议毫无进展，南京政府坚持满清皇帝退位，建立民国，北京政府反对孙逸仙为新的民国的大总统；双方武力也相持不下，但都由于得不到外国大宗借款无法战胜对方。1912年1月22日，孙逸仙为了打开这个僵局，决定以满清皇帝退位、袁世凯公开宣布支持民国政府为条件，辞去临时总统职位由袁世凯继任。袁接受这些条件。2月23日，满清皇帝退位，孙逸仙向1912年1月28日在南京建立的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两日后，国会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3月12日袁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孙逸仙决定辞职时，事先对袁并非毫无疑虑，因此，提出了民国政府首都必须在南京，袁世凯必须受参议院拟议中的临时约法的限制等条件，以便保证袁世凯对民国政府的支持。但是袁世凯决不愿意放弃北京这一个立脚点，因此泡制了一系列狡诈的政治事件，目的在使孙逸仙及其同盟会同人相信不仅他必须留在北京，而且南京的临时政府也必须迁往北京。

此时，同盟会已成为公开的政党，以孙逸仙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孙逸仙自辞去大总统之职后，把注意力从政治方面转到民生主义方面，开始考虑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黄兴一直留在南京负责留守处直到1912年6月14日。当同盟会的两个最高领导人各自忙于自己的事务时，同盟会开始发生变化。在北京的一部分会员例如宋教仁，认为革命团体的始初目的已经达到，应该进行改组，以便在国会中有效地起作用，把袁世凯置于国会控制之下。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尽可能多的席位，宋及其支持者和其

他四个小党派：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合并组成一个大的联合政党——国民党。袁世凯感觉到这是对自己的地位的威胁，邀请孙逸仙、黄兴去北京商谈国事。1912年8月24日孙逸仙到北京，第二天出席了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他对此并不热心，因为在他看来，新成立的国民党容纳了不少野心家，这些人对民生主义所包含的社会和经济建设不表同情。孙逸仙虽被公举为国民党理事长，但他把实际工作交由宋教仁负责，因为他对这类政治活动很少兴趣。

1912年8月24日到9月18日之间，孙逸仙在北京多次会见袁世凯讨论铁路建设问题。袁世凯的热情接待，解除了孙逸仙对他的疑虑，认为袁世凯是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最合适的首领。袁世凯听取了孙逸仙的铁路建设计划后，于9月9日任命他为全国铁路督办，虽然当时一些局外人认为袁世凯此举的目的不过在换取孙逸仙在政治上的公开支持。孙逸仙却以极大的热情对待自己的新职责。他的铁路计划的核心是以大笔外债修建三条干线通往缅甸、西藏和新疆。1912年秋，他前后考察了华北、华中已有的铁路线，1913年初，又去日本考察，希望获得日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投资。

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

1912年冬孙逸仙在日本时，袁世凯和国民党之间控制北京政府的斗争十分激烈。1913年2月国会选举的结果，国民党占优势，进而准备组成以国民党为主的内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所派凶手刺死。听到噩耗后，孙逸仙去上海，和黄兴一起要求彻查凶杀案并严惩凶手。1913年春，国民党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因“善后大借款”事件而加剧。6月，袁世凯镇压国民党的企图也明朗化了，当时他免除了国民党在江西、广东、安徽各地的都督，又派北洋军队向九江、南京进军。江西都督李烈钧去上海征询孙逸仙及其他国民党领袖的意见，取得孙的同意后，7月回江西宣告独立，自任讨袁军总司令，从此开始了所谓的二次革命。孙逸仙发表宣言斥责袁世凯，7月23日袁世凯免除孙逸仙铁道督办职务。庞大的装备精良的北洋军队，很快就击败了国民党军队，9月1日，南京为张勋的北洋军攻占。9月15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逸仙及其他国民党首领。孙逸仙组织力量和袁世凯对抗，但终于在

11月底去日本避居，在台湾稍事停留后，于1913年初到达东京。

孙逸仙自民国建立以来的乐观情绪，很快在对袁世凯及其外国列强的支持者的苦斗中消失。孙逸仙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推翻袁世凯。首先，他决定改组缺乏朝气又无效能的国民党。1914年6月23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员要宣誓效忠孙逸仙并在宣誓书上加盖右拇指指印。张继、黄兴等老党员拒不履行忠诚宣誓也未加入新党，但大多数老党员如陈其美、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都接受新的规定而加入了。不久出版了新的机关报《民国》杂志，又在美国、东南亚华人中发展党员。孙逸仙为取得日本对他的反袁斗争的支持，答应事成后给日方在华利益以重大让步，但此举未获成功。他和同事们草拟了革命方略，提出建立革命军队、成立军政府，以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他以新的革命军统帅的身份，指派陈其美、朱执信及其他助手回中国，组织反袁武装斗争。

1915年12月，袁世凯阴谋称帝，蔡锷、唐继尧及云南的其他军事首领起而讨袁，反袁运动很快波及西南各省。孙逸仙在国内的追随者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广东、安徽、江苏、山东各省举行起义。1916年4月反袁潮流明显得势后，孙由日本回上海。反袁运动因6月16日袁世凯身死而结束，孙逸仙电北京政府的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求他们恢复1912年的《临时约法》和1914年解散的国会，1916年9月胡汉民代表孙逸仙去北京与黎、段商讨。孙逸仙留在上海一直到1917年夏天，致力于制定在国内实现民权的方案，此时所写的文章中有一篇是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问题是主张参战的段祺瑞与国会屡次争论的一个问题，1917年5月至7月间双方争执不下，结果是议会解散，黎元洪被迫辞职，冯国璋继任总统，北京政府的实权落在段祺瑞一伙手中。

段祺瑞决定召开由他控制的“临时国会”，孙逸仙反对解散旧国会及段祺瑞的掌权，声称这两件事都违反了1912年约法。孙与几个国会议员发起意在恢复1912年约法和旧国会的“护法”运动。孙逸仙得到由程璧光（1861—1918）指挥的海军和南军首领陆荣廷、唐继尧的支持。1917年7月，孙由军舰护送，从上海到广州，同一大批旧国会议员一起召开非常国会，并于8月31日成立军

政府。非常国会公举孙逸仙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唐继尧对新政府很少兴趣，而陆荣廷在10月、11月间取得了湖南的地盘之后，对护法运动也颇为冷淡了。

孙逸仙及其支持者决心同北洋军阀斗争，并且认识到为此必须有一个军事基地，因此劝说广东省长朱庆澜将二十营警备部队交给孙的支持者陈炯明统率。广西军人对此竭力反对，但是陈炯明还是组成了一支部队，称为“援闽粤军”。1918年春，唐、陆等南方军事首领对孙逸仙及军政府渐渐不满，他们和非常国会的一些议员联合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以孙逸仙、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懌、陆荣廷、唐继尧为总裁。孙逸仙再次被排挤，遂于5月21日宣布退出广东军政府。

孙逸仙去日本作短期访问，未能取得日本对他的护法运动的支持。他回到上海，定居在法租界。此后两年半内，他写了一些重要著作，例如《建国方略》的一部分。1919年8月1日，他的两个最亲密同事朱执信、戴季陶创办了《建设》杂志，阐述党的意识形态和孙逸仙的建国方案。孙逸仙也考虑党的实际事务。中华革命党未能吸引公众注意，对中国的政治和思想生活很少影响。此外，革命组织中的许多成员，特别是海外华侨坚持把它当作国民党。为了消除由于名称问题而引起的混乱，和加强党的组织，孙逸仙在1919年10月10日宣布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

在广州，桂系军阀以武力为要挟加强对军政府的控制。1919年8月，孙逸仙正式辞去军政府的职务以示抗议。军政府内部桂系军阀的追随者和孙逸仙的支持者之间的分歧加剧的结果，是伍廷芳等官员的辞职和离开广州。1920年春，桂系和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人之间的磨擦加深后，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1920年6月，孙逸仙、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通电，声称军政府此后一切行动均归无效。8月，陈炯明率粤军由福建漳州回广东，经三个月战争，陈炯明在其他支持孙逸仙部队支援下击败桂系军队，1920年8月26日攻占广州，孙逸仙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11月，孙逸仙重回广州，又一次召开非常国会。

广东政府和陈炯明的叛乱